

文本 与 虚无

刘剑 著

之上

现代性视野中的
当代文化批评

刘剑 著

在文本 与虚无之上

现代性视野中的
当代文化批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文本与虚无之上:现代性视野中的当代文化批评/
刘剑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ISBN 978-7-208-14912-0

I. ①在… II. ①刘… III. ①文化研究-世界-现代
IV. ①G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1627 号

责任编辑 屠毅力

封面设计 陈 酌

在文本与虚无之上

——现代性视野中的当代文化批评

刘 剑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0.25 插页 2 字数 255,000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912-0/I·1684

定价 6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理论之争

对“人”的发现和疏离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狂欢话语的

意义与局限 / 3

强制阐释论与西方文论话语

——与“强制阐释”相关的三组概念辨析 / 21

古典与浪漫

——莱辛与文克尔曼美学思想辨析 / 33

在左右之间：一种及物的文化批评

——读《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
文化》 / 44

盲视与洞见

——《荀子·非十二子》今读 / 52

论木心的印象主义文学批评

——以《文学回忆录》为例 / 69

启蒙及其内在超越

——莱辛与“古今之争” / 83

人文：沟通文学与文化

——从《拉伯雷研究》看巴赫金文化诗学的

人文关怀 / 92

现代性的悖论

——读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

烟消云散了》 / 101

第二章 文本之镜

经典化与大众化

——海子诗歌接受中的两种趋向 / 111

对存在的谛听

——聂尔与他的《路上的春天》 / 130

大雅大俗刘震云 / 146

生活的强者、城市边缘人与“新新人类”

——当代知识女性文学形象的变迁 / 166

出走与回归

——帕蒂古丽乡土散文叙事中的身份认同 / 175

无言历史，有恨人生

——《圆圆曲》人物形象的另一种解读 / 182

丰饶尽头的荒凉

——《丰乳肥臀》中的反人文主义书写与后

现代精神 / 193

粗野的温柔

——评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 / 200

逃无可逃与人间温度

——读爱丽丝·门罗的《逃离》 / 207

体验、对话与仰望

——读《冯至评传》 / 213

自媒体催生的平民神话

——以女诗人余秀华为例 / 225

第三章 光影之魅

物恋与怀旧

——影像叙事中的现代性反思 / 239

《杜十娘》悲剧母题中的两种爱情观 / 248

现代性反思视野中的电影《阿凡达》 / 259

生死之谜、绝望之爱与自我治愈之路

——《曼荼罗》的三重意义空间 / 266

面对真实

——《楚门秀》观后 / 274

理想主义的末路狂歌

——浅谈韩寒和他的《后会无期》 / 281

现实主义的苦难书写与精神救赎

——电视剧《平凡的世界》观后 / 292

梦想的延伸与背叛

——新媒介时代网络游戏与文学的关系 / 302

后记 / 312

第一章 理论之争

并非所有的新锐文化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关系都是这般令人忧虑。但要说新兴文化理论中的大部分诞生于和马克思主义的极富创意的对话,看来也是公正的。这种对话始于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周围找到出路,而又不完全放弃它。它的结果分毫不差。在法国,不同基调的对话再现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之间先前的和解。其中心人物是受人尊敬的萨特。萨特曾有名言: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二十世纪在一个方面的最终境界,你可以置若罔闻,但无法逾越。

——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

文化批评家的角色在于精确地揭示“现实性”和“合理性”之间的差异,暴露事物的实然存在和应然存在之间两相对立的隔阂。……除了关注历史现实的诸多失败之外,文化批评还包含某个潜在的乌托邦维度或解放维度。它相信,通过义无反顾地关注现代的诸多缺憾,它将获得导向某个更融洽、更和谐的未来前提条件。

——理查德·沃林:《文化批评的观念》

对“人”的发现和疏离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狂欢话语的意义与局限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中的狂欢话语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不管是狂欢节的生活实践,还是狂欢化的文学体裁,或者是狂欢式的广场语言,都深深植根于人类本性,从一种生活经验到一种文学源流,再到一种狂欢化的世界感受,“狂欢”的母题贯穿于并自由游走于社会文本和文学文本之间,这使得巴赫金的狂欢话语背后始终洋溢着一种人文关怀。通过对这一母题的阐发,他在不同文本之间找到了人类精神的某些本质方面。“官方节日违反了人类节庆性的真正本性”〔1〕,而民间文化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才是文艺复兴文学的深层基础,在这里“人仿佛为了新型的、纯粹的人类关系而再生。暂时不再相互疏远。人回归到了自身,并在人们之中感觉到自己是人”〔2〕。几个世纪以来,“官方”在不断地变化着统治的面孔,而“民间”作为弱势话语却保持了相对的连贯性。因此,巴赫金力求在文化

〔1〕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1 页。

〔2〕 同上,第 12 页。

历史的长河中发现人类中一直被忽视的一群,以及人性中一直被压抑的一面,在民间话语的追溯、发掘与释放中,更丰富、深刻、全面地去理解人性。可以说,巴赫金以他自己独特的方法实现了对“人”的意义的崭新发现。

《拉伯雷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便是“狂欢”这个关键词的提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巴氏文本狂欢化的阐释以及由此引出的对中国本土文化现象的狂欢化关注,也一直不绝于缕,甚至越来越热。“狂欢”似乎已经成为理解后现代平民时代多元差异共存和自由嬉戏精神的密码。不管是余华的小说,周星驰的电影还是赵本山的小品,人们似乎都可以从“狂欢”中汲取不懈的灵感之源。然而,笔者认为“狂欢”诗学在东西方各种语境中的挪用难免有“为我所用、各取所需”的成分在,狂欢话语本身也不可避免地拖着时代的阴郁身影,带有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在此我试图通过梳理巴赫金狂欢话语在中国引起的主要争论,进一步还原巴氏写作的具体语境,理解狂欢精神的不同侧面,走近他本人独特的写作方式,追寻“狂欢”所在的具体话语位置以及它的影响,并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再解读,在承认狂欢话语意义的同时,把主要侧重点放在分析它的局限。

一、狂欢：神话抑或创见？

国内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最尖锐的质疑来自 2004 年阎真的一篇文章《想象催生的神话》，作者认为：“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具有浪漫主义特质，严重地扭曲了狂欢节真实的文化内涵，极大地夸张了狂欢节的文学意义，与狂欢节真实的文化功能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在本质上是一个想象催生的理论神话。”^{〔1〕}阎真的批评受到巴赫金研究专家夏忠宪的质疑，她认

〔1〕 阎真：《想象催生的神话——巴赫金狂欢理论质疑》，《文学评论》2004 年第 3 期。

为该文对巴赫金缺乏深入的研读,对狂欢理论的理解有明显的疏漏。巴赫金不仅没有“扭曲狂欢节真实的文化内涵”,而且“通过狂欢论复现了被人们淡忘了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生动景象,恢复了几乎湮没无闻的狂欢文化的原有风貌,揭示了由颠倒、褻渎、逆向、贬低、嘲弄、戏仿这类语言构成的民间狂欢文化的深刻内涵。巴赫金的狂欢理论是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的创见,绝非想象催生的神话,其多方面的意义是被众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的”〔1〕。在夏忠宪看来,巴赫金之所以有选择的放大狂欢节,是因为在他的意识深处,有官方/民间的节日之分,而阎真引用的布克哈特、杜兰特等人书写的恰恰都是官方的历史。巴赫金发掘的正是源远流长、现实存在而又不为官方书写所重视的民间精神,它植根于隐而不显的民间文化传统。阎真不把它看成对官方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对抗而看成互补,恰是因为僵化地理解了“对抗”的含义,只把“揭竿而起”看成对抗,而不重视弱者抵抗的策略和艺术。阎真和布克哈特、杜兰特一样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这样的理论视角使他们无法做到像巴赫金那样有洞见“两种生活”的可能,发现民间文化的力量,挖掘“对话”和“狂欢”的世界观意义。狂欢理论不仅是西方,而且是整个人类精神文化巨大经验。“狂欢理论的令人信服和正确性,在论拉伯雷的书出版后人文科学所获得许多资料中都得到了证实”〔2〕。夏忠宪的回应引起了阎真继续探讨的热情,他又写了《文化史的虚构——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七大缺失》〔3〕进一步提出质疑,他以历史的尊严和客观性的名义证明对“意义”的发现不能是任意的“过度阐释”,尽管他尊重巴赫金的挑战封闭性、反抗独白的价值观的学术姿态,认同巴赫金的理论在当时语境中是“片面的深刻”的,但是他认为这个“狂欢化”理论一回到严谨的学术视野,在历史和逻辑的双重检验之下,

〔1〕 夏忠宪:《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的创见》,《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2〕 参阅《对话·狂欢·时空体》杂志1996年第4期,1997年第1—4期。

〔3〕 阎真:《文化史的虚构——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七大缺失》,《文艺研究》2006年第12期。

马上会现出缺乏实证论据的尴尬。

通过上述论争可以看出二人的理论出发点有民间/精英的倾向不同，他们对巴赫金阐释有事实/价值，历史/文化(意义)的侧重点不同。很显见的事实是，学术不是纯粹的想象，但是人文学科的学术又必须不能缺乏灵感和想象，否则就会变成事实材料的爬梳和堆积。巴赫金无疑用的是“六经注我”的方式来研究拉伯雷的《巨人传》，一粒放纵、嬉戏的火烛经他的放大在这里燃起了一片自由、解放的火光。然而精神产品本应是精神灌注的产物，说文学作品的某种阐释“不正确”“失实”是很笨伯的做法。但是巴赫金对拉伯雷的阐释有没有“过度阐释”之嫌呢？我觉得也是有的，这里“片面的深刻”和“深刻得片面”恰可以相辅相成。

很有意思的是，赵勇写于2002年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上的一篇文章《民间话语的开掘与放大——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一看题目便知正是阎真和夏忠宪二位争执不下观点的一个合题：他对狂欢理论的把握既能看到其可贵之处，也不一味赞扬。首先，此文的前半部分说明了赵勇的阅读感受和夏忠宪很相似，正是对民间话语的发掘让巴赫金的拉伯雷阐释闪着精神的光芒，此文后半部分也等于能够理解阎真的质疑，并间接构成对话，因为在这里民间话语是“放大”的，开掘有开掘之功，放大也有放大之漏。赵勇从时间、空间、躯体、和话语四个要素进入狂欢世界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础，发掘了笑与狂欢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指出，“如此这般操作之后，民间话语的意义和力量也就在一种过度阐释中被人为地放大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显得既不真实也不可信。事实上，民间既是生产智慧话语、爽朗笑声的地方，也是盛产狡黠、油滑、世故的所在。更何况，‘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意味着民间话语很大程度上已然经过了官方话语的渗透、整合与重新编码，绝对清洁的民间精神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纯正的民间话语也纯属子虚乌有。巴赫金没有看到这一点，他只是一味地追求着狂欢的酒神效果，制造着民间的万能神

话。实在说来,这样一种乌托邦冲动既显得珍贵可爱,却也显得虚迷可疑。作为后来的审视者,我们必须看到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致命弱点。”〔1〕文中认为,狂欢化的乌托邦色彩正是巴赫金面对的压抑现实的反面投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与苏联意识形态的对话诉求是巴赫金放大“狂欢话语”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该文强调的“语境压力”与“压力下的扭曲与放大”正是阎真为成就自己的论证绕道不提的那一面,而正是因为承认这一面,赵勇认为对狂欢话语的刻意“放大”应给予“语境化”的同情和理解。

以上三篇关于狂欢化讨论的文章中,虽然侧重点不同,但是对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是人文精神的曲折表达和“语境”压力的潜在体现这一点上,还是能够达成基本共识的。在有着同样语境压力的中国知识界,人们很容易把巴赫金理解成一个“理想主义者”,不仅夏忠宪先生和赵勇先生有这样的感受,唐宏峰的一篇文章《后现代语境下的狂欢》也认为“狂欢化本质在于一种民间性,其精神实质是巴赫金充满理想化色彩的人文主义精神”〔2〕。并认为这正是他和周星驰喜剧后现代语境下的狂欢精神气质截然不同之所在。但是我觉得,巴赫金孜孜不倦地提到“民间性”和“狂欢化”,发掘他们的意义,一方面确实是内心理想的召唤和对压抑的逆向表达,另外也有(起码在表面上)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顺向同构的一面。

在我看来,巴赫金是以赛亚·伯林所说的狐狸型哲人,而不是一个刺猬型的哲人。他善于同各种主张的人们打交道,且从不正面谈及自己的信念。他身上最可贵的是一种高屋建瓴、兼收并蓄的思想家智慧,而不是

〔1〕 赵勇:《民间话语的开掘与放大——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

〔2〕 唐宏峰:《后现代语境下的狂欢——论周星驰喜剧的狂欢化色彩》,《文化研究》第四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像阿赫玛托娃、别尔嘉耶夫、索尔仁尼琴那样为真理而献身的知识分子精神，尽管在宗教哲学的观点上他或许和这些人很接近。巴赫金宁愿看重桑丘·潘沙那样唯物主义、灵活快乐的大腹丰收魔鬼，也不愿意赞扬堂吉珂德那样严肃枯燥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看来生活是一个交流的窗口，到处充满了惊奇，过度执着、高调的理想主义往往源于对生活本身的误解和偏执。而他欣赏的怪诞现实主义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降格，“即把一切高级的、精神的、理想的、抽象的东西转移到不可分割的物质—肉体层面、大地和身体的层面”〔1〕。通常人们认为拉伯雷和加尔文共同奠基了现代法语民族文学，巴赫金是拉伯雷的深刻同情者，他一定不愿意在死后被人读成加尔文。巴赫金能熟练运用新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甚至斯大林式的各种术语表达自己非常个人化的理论主张，但是“巴赫金实际上又不曾置身于俄国知识分子为真理而战斗的神圣传统之中，这多少是由于他对官方集团的不动声色、逆来顺受的态度决定的，但主要原因还是他根本反对单一真理的主张。”〔2〕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曾经说过哲人是最高的智者，有双重教诲留给人间，一面是显白的教诲，一面是隐微的教诲。巴赫金以其暧昧多义的文本、以其文本存在的有争议的方式，向我们显示的也是这样一个双面雅奴斯式的人物。我以为，他既在“隐微的教诲”意义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拉伯雷研究》本身构成和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的潜在对话；同时他又是一个在“显白教诲”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为了能获发表和或多或少改变生活现实，巴赫金也有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绕道的迎合。也就是说，《拉伯雷研究》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虽有超越时代的一面，其具体研究却不可避免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因而是有局限性的。

〔1〕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

〔2〕 克拉克·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二、民间：对“人”的发现与疏离

首先，狂欢精神的发现和民间话语密切相连，为什么巴赫金要孜孜不倦地去发现民间？难道真的像当今的大众文化拥护者认为的那样，巴赫金预见到了后民主和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因而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拉伯雷研究》中提前吹起了预言的号角？

在第一章对拉伯雷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时，巴赫金提到了自己的专著有可能填补的时代空白，迄今为止，“没有一本论拉伯雷的专著；没有一个人全面尝试根据苏联文艺学的现状和任务，尤其是根据现实主义和民间创作的历史和理论问题重新审视拉伯雷的遗产。”〔1〕这使我们从侧面看到巴赫金的理论视角不是横空出世，而是与当时的时代主流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当时苏联文艺学研究的主流气候又是怎样的呢？

美国人克拉克等人写的巴赫金的传记，间接提供了一些当时苏联文艺学界的背景材料，也为我的“绕道迎合”的观点提供了一定的根据。“三十年代末，他想写一篇研究拉伯雷的论文以便重新回到知识界的主流生活里。”〔2〕由此可见，在那个时代，对于发表作品一直很艰难的巴赫金来说，这是他沉寂多年之后面对官方出版媒体第一次正式有建设性的尝试。并且，在其论文发表之前，“民间”的声音已经被主流媒体放大。“该论文就是提交给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并且高尔基还是官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1934年，高尔基将高康大和庞大固埃引为‘口头民间文学’影响书面文学的例子，他希望这种影响能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里得

〔1〕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2〕 克拉克·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到更多的表现,而且,他发现高康大和庞大固埃具体体现了这种民间传统,在这里,低等阶层‘获得勇气,嘲弄他们的主人’。”〔1〕讽刺体裁作为阶级翻转过程中“人民性”的表现也被大力提倡。“就在高尔基提倡民间性的同时,前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建立了一个讽刺体裁研究委员会,他自己还打算写一本题为《笑的社会作用》的书。1931年1月,他在科学院讲了允许‘自由戏弄’的古老狂欢节制度对于讽刺文学史的重要意义。这篇讲话直到1935年才发表,刊于主要的理论刊物《文学批评》上。巴赫金那时大概读过此文,这可以说明‘狂欢节’一词为何出现在他自己的著作里。”〔2〕由此可见,“民间口头文学”“讽刺体”“笑文化”这些术语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苏联学术界遍地开花有着非常现实的土壤,巴赫金要想在他的时代生存,并以写作的方式生存,必须敏锐地捕捉这些风中的讯息。当然,每一个时代有他的生存不得已的理由,对此我们不必苛责,但也不必刻意盲视。那是一个意味着更多敏感话语和更严肃现实的时代。巴赫金每一次为了发表作品都要在之前数次按照检察机关的需要修改作品〔3〕。

目前中西方很多巴氏研究专家对巴赫金的阐释,习惯把巴赫金塑造成一个智慧的先知,超越了冷战时代资产阶级正统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之争,提出了对多样性、偶发性、差异性这些后现代价值的关注,并因其“对话”的世界观,“复调”的小说美学,“狂欢化”的对未来时代精神的把握,使人们对巴赫金的崇拜仰之弥高,因而对他的阐释剥离了他生存的具体语境。他的俄罗斯传记著者作家孔金夫妇在《巴赫金传》里,把生前的朋友捧成了反体制的英雄,因而也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巴赫金理论的写作缘起存在着很大的误读,也就是说欠缺布迪厄意义上的“生成性”研究。人们一般只重视其精神成果产生的总体负面条件,没有反映出他思

〔1〕〔2〕 克拉克·霍奎斯特:《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3〕 同上,第9页。

想学术里承担的具体现实压力。而巴赫金本人认为,任何“创造性的理解都不排斥自身,不排斥自身在时间中所占的位置,不摒弃自己的文化,也不忘记任何东西。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1〕,所谓的“外位性”,也就是基于“他者”的理解,基于“对话”的理解。用布迪厄的术语就是难免不是从我的“占位”出发基于“对话”对“他者”的理解。巴赫金不是超人,我们对他的理解也要借助这种“外位性”把他放到他所处时代宏大的文化潮流中去加以审视。

首先,巴赫金的民间文化研究,其无处不在的人民性,拖出了他身后那个时代阴郁的影子。阐释拉伯雷用“市民”还是“人民”,言语效果截然不同。人民是乌托邦理想的载体,在这里只是模糊而又暧昧不清的一群。巴赫金依照他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贬低任何私人性的东西,把自私地经营自己家庭的私人的事业看成是不齿的事情,把所有的物质因素和丑角真理看成不是私人一自私的,“而是具有全民的性质”〔2〕。“无论是劳动,还是食物,都是集体性的,全社会都参加的”〔3〕。巴赫金用极富煽情色彩的语言在按照他那个时代的真理制造着“人民不朽”的神话。然而,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巨人传》着力刻画的是巨人们的世界观,这些巨人是人文主义的巨人。拉伯雷的主人公是高康大,庞大固埃,约翰修士和巴奴日,而不是广场上的人群。《巨人传》着力传达的是正在上升中的市民阶级的理想,而这一点被巴赫金用“人民性”“广场的力量”“自由的旋风”等轻易置换掉了。我们还记得巴赫金说过,真正有意义的作品必须能够活在长久时间里,不依赖于过度相关性的语境,没有那些民间传说、俗话、寓言的知识背景,拉伯雷的作品应该仍然是有意义的。人们对拉伯雷的

〔1〕 巴赫金:《答〈新世界〉编辑部问》,《巴赫金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页。

〔2〕 巴赫金:《拉伯雷研究》,《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

〔3〕 同上,第325页。